全国清史学术讨论会论文简介（上）

何　　讯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南开大学历史系联合发起在北戴河召开了全国清史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六十余个科研、大专院校、文博、新闻出版等单位的清史专家和清史工作者一百三十余人参加了会议。大会围绕康、雍、乾时期的阶级和阶层、政治制度和政治斗争、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秘密宗教和秘密结社等五个专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并就编纂大型《清史》的体例问题进行了磋商。大会共收到七十篇论文。现将这些论文按总论、政治、军事、法律、人物评价、经济、阶级斗争、民族、学术思想与科技等方面分别简要介绍如下。

一、总　　论

戴逸在《努力推进清史的研究》中指出，清史研究和现实有密切的关系，和时代脉搏的跳动息息相关。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两千多年，到了清代，它具有什么特点？它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到了怎样的高度？一直处在世界先进行列的中国，到了清代为什么愈来愈落后？在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清朝处在什么地位？应该如何评价？如果没有外国的侵略，中国将会沿着什么方向发展?发展前途可能会怎样?都是清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而总结清代以来革命斗争的经验，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中国的国情，辨明前进的方向，提高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觉悟。他认为清史领域内，无论是通史的编纂、专史、专题的撰述以及史料的整理，有许多事情急待进行。必须协调全国的力量，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工作。只要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团结一致，努力工作，清史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大成绩。

王锺翰在《清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就清史与近代史的关系、与满族史的关系、档案资料的整理、专题研究的论著等问题提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清史不能替代近代史，近代史也不能代替清史。如果把清史讲明白了或写清楚了，只能对近代史的了解和研究更有好处、更有帮助。清和满族史各自有不同研究的主要对象，侧重面也不一样，满族史只是满族一个民族的活动、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而清史则是整个封建王朝的兴亡史。他建议，要抓紧整理档案，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清史室、人大清史所和第一历史档案馆联合发起，组织全国人力，通盘计划，分门别类，挑选出重大的历史事件，或以事为主，或以人为主，或以地为主，尽量把一切档案馆资料集中起来，集中多少就发表多少，不必求全责备。

二、政　　治

顾诚在《清初的迁海》一文中说，顺治十六年的长江战役显示了郑成功义师的雄厚实力，大江两岸民心的归附使清朝统治者不寒而栗，为了切断义师与汉族人民的联系、清廷于顺治十八年正式发布迁海令。作者认为，提出坚壁清野一类建议的并不限于一人，但直接引起清廷重视导致发布全面迁海令的人是房星烨和房星焕兄弟，而不是黄梧。迁海令的执行不仅使沿

海人民惨遭迫害，并且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加重我国社会的闭塞性。清廷想从经济上困死义师的目的没有达到，后来台湾回归大陆是当时的大势所趋，并不是迁海政策的结果。在清朝大臣中主张进取台湾的人都反对迁海，连清廷后来也感到失策，在官修书中仅寥寥数语一笔带过。作者还认为，纵观迁海的全过程，统治者在感到自己的统治受到威胁时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威胁缓和后的所谓开界“仁政”也是为了自身的私利，因为被迫离乡背井的迁民对于他们的统治是个不安定的因素，何况开界责令复业又可以增加统治者一笔可观的收入，从皇帝到大臣都对开界复业表现出一定的热心，名为爱民，实则爱从人民身上剥削得来的钱财。

汪茂和在《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一文中指出，至康熙中期统一台湾已势在必行，清朝在军力、财力、天时，人心等方面也都具备了完成统一的基本条件，而郑氏台湾方面此时的局势却已全面衰微。台湾的统一由可能变为现实，是与康熙帝的决心与决策，姚启圣与施琅等人多方面的努力分不开的。姚启圣在巩固福建基地，招徕内线，荐举人才，积极经营统一台湾大业等方面作出很大贡献。施琅始终以攻台自任，并提出“因剿寓抚”的正确方针，取得澎湖战役的重大胜利后，就对台湾军民实行招抚政策，郑氏投降后，又力排众议，坚持留守台湾的正确意见。作者认为，台湾的统一结束了东南地区长期的军事对峙及由此而带来的战争破坏，促成了清朝迁界政策的最后废除和海禁的解冻，从而使人民生活走向安定，生产开始恢复，贸易有了显著的发展，台湾的社会经济进一步得到了开发，并加强了与祖国大陆的联系。

徐艺圃的《试论康熙御门听政》根据清王朝的内廷秘籍《康熙起居注》所载史实，对康熙御门听政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作者认为，作为常朝制度，康熙每天早晨在乾清门听各部院衙门官员面奏政事，与大学士等磋商本章，处理全国大事，这 是 康 熙 与臣僚公开商讨、决断军政要务的表现。总观九卿等在御门听政中的地位和作用，非能与六部可比，更不能与大学士、学士比，主要原因是九卿等不是每日都能参加听政。作者指出，康熙提倡封驳等制度是封建专政制度的产物，是督促臣下忠于皇权的手段。通过御门听政，康熙在维护国家统一，抵抗外来侵略，以及选任、考核、处分官吏，发展社会经济，处理重大案件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绩。当然，也还有许多不能在乾清门听政时决断的事情，而是康熙在别的时间、地点用别种形式处理的，并且有时御门听政带有一些形式主义的色彩，但总的说来，其作用和政绩应予肯定。

史松在《康熙朝皇位继承斗争和雍正继位》中论述了康熙后期诸皇子争夺皇位继承权斗争这一震撼清前期的重大政治事件。他认为康熙鉴于不立储君不利于皇权的稳定，于康熙十四年建立了立储制度。然而这种制度并非满洲旧制，宗室贵族是不习惯的。当其他皇子成年封爵，便拉帮结伙向皇太子的储君地位挑战，从而演成皇室内部长期的激烈斗争。结果，皇四子胤禛得到皇位，是为雍正。雍正清除政敌，整理朝政，巩固了皇权，改革了立储制度，使政局得以稳定，清朝也从此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清朝前期的发展和兴盛得以延续，并在乾隆中叶达到顶点，康熙后期争夺皇位继承斗争的妥善解决，是一个重要原因。作者认为，康熙五十七年以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只不过是康熙皇帝对于他身后安排的一着妙棋，并不表示他有意传位于允禵。遣允禵西征，可谓一举数得。首先，允禵的同伙被分隔开了。其次，允禩一伙看到允禵受重任，储位有望，其注意力因之转移，咄咄逼人之势就能以缓和下来。再次，由于“兴兵逼位”的危险暂时消除，康熙就争得了时间，有条件比较从

容地安排后事。而胤禛在当时皇子中是既有能力也有足够力量对付允禩一伙并克服皇室分裂的唯一力量，因此，康熙传位胤禛，实为顺理成章之事，并非夺嫡。

李宪庆、白新良的《康、雍之际继嗣制度的演变》则着重讨论了康、雍之际争夺储位和最高权力的斗争与清代继嗣制的关系、清代继嗣制度为什么康雍之际发生了较大改变？这种改变有无其历史的必然性？继嗣制度的改变对清代政治有何影响？作者认为，康熙建储，明立皇太子是从入关前便已开始的由八旗贵族分权向中央集权过渡的历史过程的必然结果，对于康熙中期皇权的加强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太子的从政，在他周围集结了一批官僚，形成了太子党，这就必然要侵犯皇权，引起皇、储间的矛盾。康熙末年，皇权与储权经过反复的斗争较量，使康熙逐步认识到，要达到进一步加强皇权的目的，必须对已有的建储制度进行改造，因而产生了秘密建储的打算。至雍正即位，则把它定为一项建储制度。秘密建储制度的出现，不仅标志着自皇太极以来历代满州统治者为争取皇权集中和进一步封建化的斗争达到了一个新阶段，而且对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完善化及其成熟起了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

季士家的《浅论军机处与极权政治》，分析了军机处产生的历史背景、建立过程、机构情况、性质和作用。他认为军机处发端于康熙、建立于雍正、定制于乾隆，绵亘于清代的发展过程；作为君权的附庸，在我国历史上，结束了延续近两千年的君权与相权的斗争，把封建专制主义推到宝塔之巅，实现了由皇帝“乾纲独揽”的极权政治的目的。作者认为军机处成立于雍正七年（1729年），经过“军需房”、“军机房”、“军机处”三个发展阶段。军机处的特点可概括为三：班子精干，军机处全部人员不过四十人左右，办理一国之军国政要；在职官员多为才干之士，特别是军机章京，“年富力强”；办事速捷，雷厉风行，始终保持着较之原内阁更高的效率。

鄂世镛《浅谈雍正用人》认为，雍正帝前承其父康熙的政治，进而扬长避短，有着一种新的振作；后为其子乾隆统治时期的繁盛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他的继往开来之功，就不会有这样一个持续将近一世纪半的康、雍、乾时期的发展。雍正帝是具有长于驾驭群臣优于治国的一位有作为的皇帝。他治国以用人为本，主张秉公举贤、不徇私情、不拘资格选用德才兼备人才。他明察善任，赏罚分明，要求务实和保密，体恤官员。他创立的用人特殊手段——密奏密谕制，对于沟通与封疆大吏之间的上下联系，加强统治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由于雍正选用了一批无限忠于他的善于治理封建国家的人才，在君臣协力同心之下，经过励精图治，扭转了康熙末年以来的因循保守和贪污腐化的颓风，使清朝的统治有了新的振作，从而促进了社会的继续向前发展。由于雍正用人以操守和才具兼备为准则，从而打破了传统旧规。他力倡华夷无别，进一步冲击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畛域，冲击了满洲贵族八旗官兵及其子弟依靠“世袭地位”和“血统门第”做官的特权，从而改造了清初以来的贵族官僚政治。

陈洪《略论雍正帝整顿吏治》指出，康熙晚年朋党祸烈，吏治废驰，巧宦充斥，官场腐败，贪风盛行，以致国用入不敷出。康熙帝虽然看到并企图解决这些问题，但他已是强弩之末，力不从心了。整顿吏治的重任就历史地落在雍正帝的肩上。雍正继位初年，在果断地铲除允禄、允禟和年羹尧、隆科多等朋党同时，用很大的力量惩治巧宦和贪官，整顿自康熙晚年以来极为废驰腐败的官僚政治。采取的措施一是广开言路，二是加强对各级官吏的监察和考核。他还扩大了密奏范围，支持地方官揭发、打击犯法的宗室权贵。他在清除巧宦和昏官的同时，又大量提拔一批官员充实各级国家机关，特别重视用人。他强调用人不可存满汉之见，只能论其贤否；不能光看资历而要看才干，以及注意从基层选拔人材，要求选择官员要

慎重等等。雍正帝励精图治，对吏治的整顿切中康熙晚年的时弊，从而巩固发展了康熙政绩中的积极成果，为雍乾盛世的繁荣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赵德贵《略论雍正理财》一文就雍正的理财方针政策、措施与效果以及经验教训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裕国安民、开源节流是雍正理财的方针。其中“裕国”是理财的思想核心和根本目的，虽然雍正以搜括钱粮充实国库为首要任务，但是他反对“止为钱粮”“不顾百姓”的过苛作法。雍正帝虽提倡重农务本，但并不强调抑商，主张“通商裕国”，“籍贸易之盈余，佐耕耘之不足”。他在理财方面的具体措施，包括改革赋税制度，集中财权，考核官吏，严惩贪污，奖励耕垦，发展贸易，崇俭抑奢，蠲免逋欠等等。作者认为，雍正整顿财政之所以成功，在于他从整体着手，全面解决，坚持到底，决不半途而废，洞悉下情，提倡务实。

这次大会论述雍正朝政治制度与措施的文章相对说来多一些，而乾隆朝就比较少了。夏家骏的《乾隆削冗评议》则着重探讨了乾隆皇帝削冗措施。作者认为，乾隆承袭了康熙、雍正时期开创的最盛局面，但也承受了渐多的冗闲。乾隆初年，社会上的僧道和朝野中的冗官，已组织成了一张庞大的寄食网。乾隆帝面对这种局面，不仅没有扩大满族冗员的任官，而且对满、汉中应该削减的冗员还进行了一定的裁减。对于雍、乾之际出现的官员过多而且受官无实的问题，乾隆的削减措施一是反滥举、二是严铨选。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和提高工作效率，乾隆还进行了革疾官、惩玩忽和定限期的工作。对僧尼、道士和喇嘛进行限制、甚至予以驱逐，这种减少社会非生产人员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当然，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削冗并不彻底。但是，在当时这一措施基本上改变了早先老官排队候选的情形，可以说是给开始衰老的清朝的国家机器，注进了一些促进新陈代谢的青春的活力。

三、军　　事

邢玉林在《围绕平定“三藩”之乱述评康熙的军事思想》一文中指出，康熙皇帝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也是著名的军事家。他的军事思想来源于战争实践，其中平定“三藩”的战役对于他的军事思想的形成和深化关系极大。康熙在这次战役中亲自决策，练兵筹饷，分兵防守，调兵遣将，因时因地处处持重，不以一时一地之得失来判断敌我的最后胜利，而以力歼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从而使自己积累了一套丰富的用兵之道和统将之术。作者认为，康熙重汉将不是为了“以汉制汉”，而是他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长期优裕的生活已磨损了八旗兵的锐气，新一代的八旗将领又多是些缺少实战经验，而又庸碌无能的人，为了扭转初期不利的战局，康熙不得不果断地采取措施，提拔和重用那些有才能有战功的汉将。

洪用斌《乌兰布通之战》一文，对著名的乌兰布通战役进行了全面的述评，作者认为，以康熙为首的地主阶级国家政权，为了削平割据分裂，稳定中国广大版图的政治目的，遭到了厄鲁特准噶尔部以噶尔丹为首的政治集团的阻碍，产生了矛盾，双方为了扫除各自在政治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于是爆发了战争。其次，由于游牧经济生产方式本身的特点，与中原农业经济的彼此的依存性较强烈，这种依存性在互市问题上表现出来的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是导致战争产生的经济原因。国家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康熙帝为维护统一而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而噶尔丹为破坏统一而进行的战争则是非正义的，加之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噶尔丹在战略和战术上都犯有严重错误，所以，为正义而战的清军终于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四、法　　律

“逃人事件”是清初的暴政虐行之一，徐凯《清初逃人事件述略》一文，以顺治、康熙

两朝为重点，就逃人问题的缘起、奴仆的遽增与逃亡者的扩大、多尔衮对逃窝的镇压、逃人法的更定及其斗争、逃人法的松弛及督捕衙门的裁撤等问题展开全面的论述。作者认为，逃人的出现是汉族人民对满族农奴制残余的反抗。多尔衮为维护农奴制生产方式，为战争的需要，对逃人野蛮镇压。福临亲政后，使逃人法逐步完善，设立督捕衙门，造成了极严重的社会问题。全国统一后，封建租佃关系明确了，这就为玄烨解决逃人事件提供了成熟的客观条件，由于玄烨采取有力措施加强皇权，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较好地实现了农奴制向封建制的转化，逃人问题也就基本上得到解决，这是康熙朝由乱到治的标志之一。

赵云田在《清代蒙古刑法探述》一文中，对清代蒙古刑法的形成变化、主要内容、刑法种类、治理机构、审讯程序等问题作了简略的探述。作者认为，清代的蒙古刑法形成于天聪七年颁布的《盛京定例》，完善于乾隆六十年新刊的《蒙古律例》。包括盗贼、人命、首告、扑亡、杂犯、断狱、喇嘛例等七项。按习惯称谓，刑罚可分为生命刑、身体刑、自由刑、财产刑四类。其刑法机构在中央是理藩院理刑清吏司，在地方是蒙古的“旗”机关，凡有刑事案件，必须先在该旗呈控，如不服，可上呈控于盟长处，再不服则上呈控于理藩院。作者认为，清代蒙古刑法是蒙古习惯法的继承和发展，是清朝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满族贵族和蒙古王公压迫广大蒙古劳动人民的工具。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蒙古刑法对进一步促进蒙古地区封建化的进程，稳定社会秩序，粉碎沙俄渗透、扩张、侵略的阴谋，都曾产生过积极的作用。

五、人物评价

陈作荣在《论多尔衮》中，认为多尔衮是清朝奠基人之一，入关前他与皇太极相辅相成，对推进 满族 封建 化，发展 封建专制主义有积极贡献。他摄政以后，继续加强中央集权，为清军入关集中力量，及时地完成了积极进取中原的战略转变，以及随之而进行的策略上的调整，从而赢得了入关战役的决定性胜利，顺利地占领北京。在统一全国事业中，多尔衮争取利用汉族地主阶级的策略，使清军很快掌握了全国的大局，实现了全国的基本统一。作者又指出，在清朝建立中，多尔衮既是满族进步势力的代表，又是某些落后生产方式残迹和陈旧习俗的保护人。从推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来看，多尔衮摄政“只是重复陈旧的历史”，并且使高度发展了的封建生产方式，增加了某些落后因素，因而使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受到影响。

金成基在《评多尔衮》一文中，作者认为福临继位不是多尔衮的功劳，实际上是他感到势孤力单，想籍此机会排除豪格，为自己谋夺辅政大权。因此，作者不同意说皇太极死后，由于多尔衮“断然决策，拥立福临，终于避免了内乱”，“成了一个挽救危局的人”。本文认为多尔衮摄政以后，他利用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有利时机，统领满族入关，随之作出迁都北京，进取江南的决策，这为清王朝日后统一全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起了开创局面的作用，这点是应予肯定的。但是在顺治二年五月，清王朝占领南京前后，由于多尔衮强制推行圈地、投充、逃人、剃发等一系列民族高压政策，终于激化了满汉之间的矛盾，形势急转直下，使入关之初出现的大好局面毁于一旦，大大延缓了统一的进程，严重摧残了清初的社会经济，这不仅损害了汉族人民的利益，也违背了清统治者的长远利益。

李燕光在《康熙皇帝》一文中，指出康熙主政正处满族刚刚进入封建社会，又面临着统治全国各族人民的新局面；汉族则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资本主义已经萌芽；欧洲国家的资本主义正在成长，处于原始积累时期。作者认为必须把康熙放在以上历史范畴中进行评价，

他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实行开垦、开矿、开海禁等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措施。但是到了后期又实行禁矿、禁海等政策，因而又阻碍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受到的挫折更大。这就使本来已经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差距更加扩大了，而后出现了中国被动挨打的局面，这是确定康熙皇帝历史地位的关键之处。当然康熙在加强边疆地区的统治力量，巩固祖国的统一，作出了贡献。但是他以理学作为制定政策的思想基础，虽然获得汉族士大夫的支持，对当时经济文化的发展，却起了消极的作用。所以康熙皇帝是一位功过分明的历史人物，全部肯定或全部否定，都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李国梁、布尼阿林在《论康熙》一文中，认为康熙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诚然，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措施和主张，是在维护封建统治，巩固自己统治阶级地位的前提下进行的，其结果也只能是对整个封建统治修修补补。由于康熙是地主、贵族的总代表，也曾联合汉族地主阶级镇压过农民起义，在剥削人民，压迫人民，推行专制主义等方面，和各族人民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由于他所处的时代和阶级地位所决定的。但是，他推行的一些进步政策以及对国家的团结、统一和领土完整等方面的功绩是应该肯定的。他认真地对自然科学探索，虚心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洋为中用，也是有益于人类的。他的生活作风、品格、勤奋好学的精神，即使在今天也有可学习借鉴的地方。所以在历代帝王中，康熙不愧是一位英明的皇帝，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中一位有远见、有作为的政治家。

冯尔康在《论雍正帝和他的时代》一文中，指出从一个人物看一个时代，是进行历史研究的目的之一，也是一种研究方法。所以作者从调整生产关系、造成比较清明和稳定的政治、巩固与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三方面说明雍正是个奋发有为的君主。接着作者认为雍正时代，经济上升、政治安定、因此有利于清代社会持续前进，也使它自身属于清代前期发展阶段。作者又进一步指出，封建制衰落和满族发展时代，是允许历史人物有大作为的，既然如此，时代也就允许和要求封建人物沿着封建制实行改革，去发展它，维护它，延长它的寿命，不过这种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受到极大的限制罢了，因此象雍正帝这样比较杰出的帝王的出现，是当时社会条件允许的和需要的。所以比较杰出的历史人物雍正帝的出现，是还允许改革的中国封建制和发展中的满族所哺育的，也是他本人积极努力的结果。它表明封建社会还可以有所发展，还没有走完它应走的路程。

李治亭、孙文良在《尚可喜与〈尚氏宗谱〉研究》一文中，作者根据《尚氏宗谱》及附录其后的《元功垂范》，认为尚可喜是清初发展史上一位杰出人物，他归清以后四十余年征战，为缔造多民族的国家政权——清王朝，为发展和密切满汉民族关系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当这个政权“君临天下”时，尚可喜极力维护国家的安定与统一，坚决反对分裂，表现了他以大局为重的政治胸怀。他的远见、胆识与贡献，深得太宗、世祖、圣祖王朝的信任与倚重。但是后人对尚可喜评价则毁誉不一，褒贬皆有，这是由于受到史料的限制和传统观念的某些影响，对他的评价不尽完善，亦不尽正确。

夏光辅在《论吴三桂的几个问题》中，作者谈了五个问题。其一，认为吴三桂降清，只是为清军提供了一条入关的大道，加速了清军胜利的进程，把吴三桂降清夸大为清军胜利入关的决定性因素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其二，认为吴三桂降清的主要原因，是清帝长期策反活动的结果，不同意说吴三桂为争夺陈园园而降清的看法，此事只是一个导火线；其三，指出现在有同志为了歌颂农民起义领袖，不仅否定吴三桂为陈园园而降清，从而否定陈园园这个人的真实性。实际上透过此事看到吴三桂仇恨农民军，而刘宗敏“系襄索沅”正是农民军

策略的失误表现；其四，认为李定国之死和大西军的彻底失败，标志着以农民军为主力的武装抗清斗争的结束；其五，认为吴三桂发动的三藩之乱是满汉地主阶级内部的争权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康熙帝代表统一力量，吴三桂代表封建割据势力，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

栗振复在《乾隆抗俄的历史贡献》一文中指出，俄国大农奴主的阶级本性和它对欧亚的霸权野心，决定它在康乾时期对中国推行扩张主义的必然性，乾隆在位时期成功地捍卫了我国北部领土的安全，维护了国家主权的完整，争得了“康乾盛世”所必须的国际和平环境，粉碎了沙俄鲸吞我国，深入亚洲，建立大俄罗斯帝国，称霸世界的野心。作者认为，乾隆所以能在抗俄斗争中有如此贡献，主要是他顺应了清代前期的历史发展趋势，充分利用其统治地位，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经过努力奋斗而获得的。

«清史»编纂体例讨论

·编者按·

关于编写一部大型《清史》的设想提出以后，正引起日益广泛的重视。但在组成正式的编写机构以前，还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其中之一就是全书体例问题的讨论。体例问题是包容和表现全书内容的形式问题。我们必须选择适当的体例，使全书内容和形式得到最完美的统一和结合。为此，本刊从本期起开辟“《清史》编纂体例讨论”专栏，就编写大型《清史》的体例问题进行讨论，以期集思广益，提供将来的编写机构进行研究和选择。我们希望全国清史工作者、爱好者和广大读者踊跃参加讨论，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本刊将不作结论。

关于编纂《清史》体例的讨论草案

楚　　高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委托，起草了《〈清史〉编纂规划(草案)》。一九七九年三月，在成都全国史学规划会议上曾印发讨论。一九八二年七月，上述单位对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并将它提交在北戴河举行的全国清史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与会同志进行了热烈讨论，发表了各种不同的意见。会后，对草案又作了某些补充修改。

这份修改草案初步设想，大型《清史》共分六个部分：

（一）通史部分，分十卷，约二百五十万字。

（二）专史部分，分三十五卷，包括农业、工业、水利、商业、财政、中外关系、自然